

第 1 章

语言哲学概论

1.1 西方哲学史概述：四个转向

学习西方哲学有多种方法，“以史为鉴”当算其中的主要途径。西方哲学在 2 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转向：

- ① 毕因论（ontology，即本体论、存在论）；
- ② 认识论（epistemology）；
- ③ 语言论（linguistics）；
- ④ 后现代论（postmodernism）。

现将其总结在表 1-1 中，可使我们对其能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理解这四个转向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寅，2019b）：

表 1-1 西哲四转向综述

	毕因论	认识论	语言论	后现代
1	WHAT is this?	HOW is this?	What is IS?	多元性
2	存在的实在性	存在的认识性	存在的表达性	存在的人本性
3	客主关系	主客关系	用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代替主客关系	主客主
4	从本质来认识世界	从观念和思想认识世界	从语言分析来认识世界	从“人”来认识世界
5	现象是本质的体现	心智是世界的镜像（笛、康擦镜子）	语言与世界为同构	语言拟构世界

(续表)

	毕因论	认识论	语言论	后现代
6	据毕因说明观念和语词	据观念来说明毕因	用语言说出毕因	否定本质
7	现实的准确再现于本质，用神目之眼来审视现实背后的形而上	现实的准确再现于心智，用心智之眼来审视网膜成像的真实性	现实的准确再现于语言，用语言之眼来审视网膜成像的真实性	无准确性，用人之非理性之眼来审视世界和哲学
8	本质、本体、本源	真知、概念、思想、命题	意义、指称、真、逻辑必然性、证实、言语行为	非哲学、超基础、去中心、非理性、后人道、破与建

西方哲学在公元前 6 世纪主要流行“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认为可通过研究“自然因”来解释世界，即用自然界某一或某些物质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如世界分别是由如下自然物质构成的：

- ① 泰勒斯 (Thales，约公元前 624—前 547)：“水说”；
 - ② 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约公元前 585—前 526)：“气说”；
 - ③ 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约公元前 540—前 480)：“火说”；
 - ④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约公元前 460—前 370)：“原子说”；
 - ⑤ 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s，约公元前 500—前 428)：“种子说”；
 - ⑥ 恩培多克勒 (Empedokles，约公元前 495—前 435)：“火气水土说”
-

我国古代哲学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如《易经》中的“八卦说”(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尚书》中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管仲(公元前 725—前 645)的“水说”和“精气说”等。

自巴门尼德 (Parmenides，公元前 515—前 445)、苏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 469—前 399)、柏拉图 (Plato，公元前 427—前 347) 之后，西方古代哲学家就开始转向用抽象的“毕因”(being)和“理念”(eidos)来解释世界的本源，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 还提出了抽象的“四因说”，从而出现了“第一次转向”，将哲学研究导向了追问“抽象本质”的方向，建构了流行2 000多年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参见表1-1中的“毕因论”一栏。

在古希腊语中，ont- 为连系动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be，研究 be 或 being 的学问就是 ontology，这一术语在我国有很多译法，如本体论、存在论、有论、是论等，我们根据 being 的发音将其译为“毕因”，为“穷尽原因”之义，还暗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至于巴门尼德为何要将 be 和 being 视为世界的本质，这就要从语言中最简单的主系表句型说起(王寅，2014)，当我们说：

[1] This is a book (...).

时，普通人关心的是表语(如 book)，而哲学家关心的是它为什么是 book，“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称它为 book。进而言之，一切有关 book 的本质就该蕴含在 be 之中，人们才能用 be 来判断它是 book，因此 be 就蕴含了表语的本质，这就是一般哲学书中所说的“是之为是”。此外，表语(或主语)可用无限多的名词性词语，但唯有 be 不变，这个 be 就是“万变之后的不变”，这完全符合形而上哲学的宗旨，从若干“多”的现象中找到不变的本质“一”。

但哲学家就什么是世界的抽象本质，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众说纷纭。当西方进入中世纪的神学时代后，人们认为这个本质只有万能的“神”才能知道，因为“God knows everything”。当人类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后，人们逐步确立了“人文观”(humanism，也可译为人为本观)，学界开始重视人的主体因素，主张从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世界，从而将哲学研究导向了“认识论”。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阵营：

- ① 经验论 (empiricism);
- ② 唯理论 (rationalism)。

这两大阵营都主张从“人是如何认识世界、获得真知”这一角度来研究哲学：前者认为我们的真知来自人们的经验；后者认为经验不可靠，唯有理性才能出真知，世界是人看出来的，这就是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 和康德(Kant, 1724—1804) 的那两句名言：

[2] I think, therefore I am.

[3] 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

从表 1-1 可见，毕因论时期追求的是“客主”关系，“客”在前，“主”在后，客观世界镜像般地映射入主体人的心智。而到了认识论阶段，哲学家颠倒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主”置于“客”之前，形成了“主客”关系，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国内学界常将其称为“先验唯心论”。

认识论中这两大阵营争论持续了 300 多年，最后就像“先有鸡，还是蛋”的问题一样，没有达成共识，哲学家就将视野转向“语言”，因为不管是毕因论，还是认识论，它们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由于自然语言在本质上具有模糊性，不能满足哲学对精确性的需要，哲学家开始反思自然语言之不足，开始将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对人工语言的设想付诸实施，从而在哲学界形成了“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经过近百年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又出现了“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ist turn）。

现将西方哲学所经历的四大转向图示如下（图 1-1），以能形成一个大致宏观体系，可使我们对其间的传承和接续关系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理解和掌握。图 1-1 所列述的第一和第二转向省略未讲，详见王寅（2007c、2014），图 1-1 主要列述了第三和第四转向，它们基本代表了百余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新动向，特别是最后一行带双画线部分，它代表着哲学研究纵向发展的最前沿。

1.2 语哲学习之主线：四五六七

王寅（2014）曾以“四五六七”这四个数字为这门学科做了概括：

- ① 四个转向；
- ② 五段情缘；
- ③ 六项成因；
- ④ 七条途径。

现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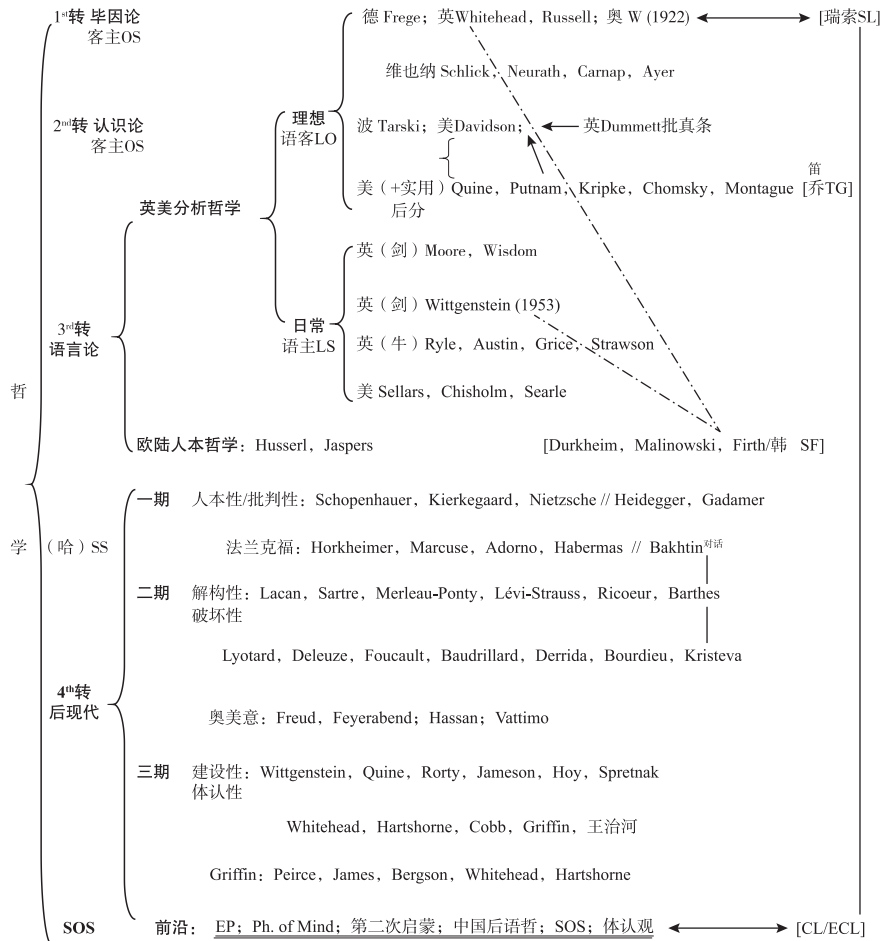


图 1-1 西哲第三和第四转向概况

1.2.1 四个转向

我们已在本章 1.1 小节做了简介，此处不再赘述。

1.2.2 五段情缘

西方的语言学原来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在不同时期都对语言阐发了重要观点，现根据图 1-1 所列简史分五个阶段简述如下。

1. 古希腊时期的毕因论转向

毕因论时期的哲学家在关注世界本质时，也问及了语言的本质，认为语法可代表语言的本质，因此西方的“语法学”历史源远流长。与此同时他们还论述了：

语言天赋论：由于古代学者知识的缺乏，对很多问题难以做出科学的回答，便将其归结为“天赋论”。

逻各斯一体论：logos（相当于汉语的“道”），既可代表世界的本源，也表示“语言”，这说明语言与世界本质是一体的。

语言工具论：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这一语言观，将它视为一种工具，是传递思想、进行交流的工具，后来也将其视为“思维”的工具。

“二元论”（dualism）语言观：依据形而上学之根本原则“二元论”来研究语言，方法划分语言系统——形式与意义、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自然与习惯、约定与本质、名词与动词、主语与谓语等。

自然论与约定论：古希腊哲学家早就语言符号具有“自然性”（理据性、象似性）还是“约定性”（任意性）展开了讨论。

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还创立了“词源学”和“修辞学”。

2. 中世纪的神学本位论转向

当毕因论时期的哲学家就世界本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在奥古斯汀的“信仰大于理性”的指引下，将哲学研究转向了“上帝”，漫长的中世纪（5—15 世纪）主要有“神学毕因论”（theological ontology），此时的宗教哲学占据了主流地位约 1 000 年之久。此时的哲学家就语言问题提出了如下观点：

上帝创造语言：在神本位的统摄下，哲学家们将难以回答的语言起源问题归结为“上帝”，继续持“语言天赋观”。

唯名论与唯实论：宗教哲学家用他们所热衷论述的“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实论”（realism）来解释语言。前者认为抽象名词不是实体，它们仅是名称而已；后者认为抽象名词也是实体，而且是先于个体存在的。

殊相论与共相论：即“个体”与“类别”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哲学家们在二者的先后顺序上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与“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有同源关系。语言究竟是先有“集体名词”，还是先“个体名词”，学界为此争论不休。

“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又叫哲学语法，出现在13、14世纪时期的一种语法理论，深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类语言镜像般地反映了物质世界的现实结构，语法提供了人们理解现实结构的线索。思辨语法还认为，所有语言的结构底层都有一种共同的、普遍的语法，它是以理性法则为基础的，研究它就可作为语言提供统一解释。

自然兼约定论：这个时期的学者沿着古希腊时期提出的“语言自然论”（语符像似于外部世界）和“语言约定论”（语符与客观世界无关，仅是人们的约定）展开了讨论，且提出了二者兼而有之的观点。

助范畴词研究：在亚里士多德所分析出的十大范畴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次要类别，共50多种，主要分为三类：饰主语的词语；修饰谓语的词语；说明主语与谓语连接关系的词语（王寅，2014）。

3. 近代时期的认识论转向

这个时期的哲学就语言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

天赋说与模仿说：笛卡尔的“天赋观”（nativism）和“二元论”再次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该观点也影响了学界对语言的认识，认为语言具有天赋性，可用二分的方法来研究。

语言模糊性：自然语言不很精确，会影响正常交际。培根（Bacon，1561—1626）（四假象说）、洛克（Locke，1632—1704）（自然语言七缺陷）和休谟（Hume，1711—1776）（感觉和概念都具有不确定性）等都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普遍唯理语法：是由阿尔诺（Arnauld，1612—1694）和朗斯诺（Lancelot，1615—1695）基于中世纪的思辨语法和笛卡尔的理性论建立起来的，认为“理性、逻辑、概念”具有普遍性，语言是它们的表现形式，语法当依据逻辑而建，因此语言和语法都具有普遍性。

实证主义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实证主义是孔德（Comte，1798—1857）于19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斯宾塞和马赫为其继承者，都认为一切真知都应得到经验事实的验证，哲学家应关心能被实证的命题。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据此开始调查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逐步建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梳理出十大语系，发现了四种语言类型，深入研究词源学。

机械论语言定律：依据实证主义，有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发现了机械性的语言定律，特别是“格里姆定律”（Grim's law）和“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它们对音变规律进行了机械性的论述。

语言决定世界观：洪堡特（Humboldt，1767—1835）于1836年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语言对人们思维方法的影响，该书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为百年后出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4. 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论转向

由于索绪尔（Saussure，1857—1913）的出场，语言学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索氏被学界尊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近百年的语言学开始走向辉煌：

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沿着形而上哲学的二元论，对语言交际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二元切分，紧紧关闭了语言之门，实现了“语言内指论”（关门主义）转向，且批判了语言工具论，提出了“语言使思想出场”的主要命题。

乔姆斯基（Chomsky, 1928—）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承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和先哲们的“普遍观”，沿着索氏的“关门论”提出了“语言自治观”和“句法自治观”，武断地将语言切分为三个“模块”，且将时下流行的“科学主义”“形式主义”引入语言学研究之中。

语言学的语义学和语用学：一批语言学家将语言哲学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引入语言学界，创立了语言学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

边缘学科：很多学者在“跨学科研究”的驱动下，始而将语言学与许多其他学科相边缘，建立了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

5.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后现代转向

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出场，主张从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一角度来研究语言成因和认知机制或体认机制，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客主兼治的人本观，以及后现代哲学观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强调语言的体认性、多元性，认为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大力倡导蓝纳格（Langacker, 1942—）基于用法的模型。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之“同”，在于我们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面对着相同的客观世界；语言之“异”，在于人们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世界的方式有较大差异。

1.2.3 六项成因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形成的语言哲学思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学术背景。自古希腊时期，哲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但到那个时期，很多学科从哲学中独立出去，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哲学家有了危机感，发出了“哲学家路在何方”的感叹，他们都在努力为哲学研究寻找新的出路。很多学者想到了“可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现再梳理如下六项成因，以供参考。

1. 反思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的主旨就是形而上学，此处的“形”就是指“本质”，旨在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为人类奠定认识世界的根本大法。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那些深受青睐的抽象概念、绝对真理、纯粹理念、精确定义、全景解释常常是遥不可及，难以“实证”。罗素（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维也纳学派等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简称逻实论），严厉批判了形而上学之误导；他们另辟蹊径，借助语言的逻辑分析法来消除那些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以解决形而上学误用和乱用语言的现象。

弗莱格（Frege，1848—1925）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证明了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使得哲学家们走出哲学传统研究道路。后继者还提出了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分析语言，阐明词语和语句的意义。罗素建构的“摹状论”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图画论”以及“对不可言说的保持沉默”，可揭示空名不可作命题的主词之奥秘，基于“逻辑分析”提出了“语言与世界同构”的观点，语句正是描写了外界的实际情形而具有意义，这样便可消解形而上学的伪命题。

2. 经验兼理性

语言哲学家们认为，仅在形而上学框架中做抽象的理性思辨毫无意义，若依据传统实证主义，仅局限于经验范围也是不够的。康德一方面认为感觉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出发点，承认意识之外存在实物世界，即“物自体”；另一方面，他又支持理性论，指出物自体具有超验性，不可被人认识。逻辑实证主义是“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产物，既降低了证实原则，又承认了理性逻辑的地位，尝试将哲学界的两大阵营——经验论与理性论——结合起来。

3. 人工语言出场

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若要消除哲学中许多因语言混乱所致的假命题，必须先消除语言中的含糊现象。他们接受了培根、霍布斯